《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探析

崔雪茹,尹 倩[1]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水浒传》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通过作品的故事设定、人物形象、创作目的等方面体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价值。《水浒传》中从故事设定来看体现了儒家的仁政与民本思想。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几乎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形象,具有仁义、孝顺、忠良、守信等品质。而以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形象与梁山好汉们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奸邪、狡诈、荒淫、虚伪、腐败,与梁山好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施耐庵通过《水浒传》对现实的影射,表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体现了作者心中对儒家仁政学说以及理想君子形象的向往和追求。

[关键词] 创作目的; 故事设定; 人物塑造; 仁政学说; 君子
[中图分类号] I20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2-0101-06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30

每个时代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思想对文化的影响,具体又可以在文学、绘画、书法、建筑、习俗等载体上体现。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对创作者的性格、价值观、思想观念等的影响,而后才进一步体现在创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创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其创作的意图、文章的故事线、人物形象设定、场景情节规划以及书中引用或化用的句子等等,都能充分地体现时代思想对其重要影响。儒家思想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一直处于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徽宗宣和年间,政治腐败黑暗,社会矛盾加深,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因声势浩大,便在民间流传许多奇闻轶事,《水浒传》便是施耐庵在汇总和改编众多民间传说、中国古典小说分支之一的话本和被许多元杂剧作家偏爱的水浒戏的基础上再次创作而成的。在漫长辉煌的中国文学历史中,《水浒传》是第一部深刻描写轰轰烈烈反抗社会不平等的农民起义的宏伟著作,生动地展示了浩浩荡荡、史无前例的农民反抗封建官僚的激烈斗争场面。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封建官僚的逼迫下人民不得不反抗的社会现实,赞扬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在《水浒传》众多英雄故事中,蕴含着许多儒家的思想文化,其表达的主题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内涵。

不仅如此,《水浒传》臧否人物的依据、判别是非善恶的价值取向,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从儒家汲取的。如高俅粉墨登场时,被评论道:"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1]14 这鲜明地体现了《水浒传》以儒家的伦理观念臧否褒贬人物,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说,系儒家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加上忠孝,就几乎包容了三纲五常的全部内容。作者以此来评定高俅,鲜明反映出"忠义"这一儒家价值准则的盛行。同样,对其他人物的评价也莫不外乎如此。

一 儒家思想对《水浒传》故事设定上的影响

故事设定是文章和小说的框架,文章始终围绕设定的故事展开。作者在设定故事情节的时候,必定会受到自己的思想观念、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影响。

(一)《水浒传》故事设定中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和正名思想

《水浒传》主要讲述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集聚造反、反抗朝

[收稿日期] 2021-11-09
[基金项目] 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素养的实践培育"资助(编号:2021YJG044)
[作者简介] 崔雪茹(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1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廷欺压,后又接受招安,最终彻底消亡的悲壮故事。其实这整个故事设定能够明显地体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一直强调“仁政”,强调以民为本。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135(《论语·子路》)为政者遵从礼,百姓就不敢不敬;为政者讲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为政者讲信用,百姓就不敢不真情相待。而《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起义造反,就正是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朝廷的腐败,造成社会黑暗不公,局势动荡错乱。

同时,儒家思想强调“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3]而最后宋江等人的妥协、梁山好汉全体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体现了他们内心“替天行道”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君思想。

林冲原本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外号“豹子头”,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对于朝廷一直是忠诚的。林冲的妻子差点被高衙内侮辱,高俅又有意陷害他,导致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闯军事重地白虎堂,被刺配去沧州。刺配途中还险些被高俅买通的公差害死。得知真相后林冲终于明白一味地忍让没有活路,于是愤怒之下杀了放火暗算他的小贼,连夜冒雪投奔梁山泊。遭到如此迫害,林冲也只是对贪官佞臣抱有恨意,并没有反皇帝之心,对待招安也是持赞成态度。除林冲之外,宋江、关胜、朱仝等一些梁山好汉都愿意为朝廷效忠,渴望得到重用,征讨敌军时也拼尽全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可见“名分”在他们心里的重要性。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134 强调了名分的重要性。宋江作为梁山好汉的首领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最终,虽仍有人心存不甘,但梁山英雄好汉们还是接受了招安。由此可见,小说最后接受招安的情节,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正名”思想。

(二)《水浒传》故事设定中体现了儒家的忠义思想

孟子曾在“鱼”与“熊掌”之间、“生”与“义”之间“舍生而取义”,强调义的重要性。那么“义”是什么呢?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写到:“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4],这就是“义”的含义。而在《水浒传》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或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等等,都是道义的展现。梁山好汉们最讲信义,无论是因为情势所迫还是志趣相投,来到梁山投靠的一百单八将无一不是把义气放在首位。

《孟子》中说:“义,人之正路也。”[5]《荀子》中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梁山聚义誓词中也处处强调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1]865“义”是义气,是好汉们的惺惺相惜、两肋插刀。宋江以“义”招揽人才,所以前来投奔的人也都愿意追随他,可见“义”字深深镌刻在梁山好汉们的价值观之中。由于小说人物多偏草莽英雄一类,混迹江湖,故其外在表现形式多为“江湖义气”。现以小说中的具体故事情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李逵本是沂水的一名衙役,因与戴宗一行人劫法场救下宋江被朝廷通缉,上梁山落草。李逵与宋江的情谊,源于江州水上宋江在李逵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借给李逵十两银子,当时的李逵身无分文,负债累累,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自此以后李逵便认定了宋江,对宋江慷慨佩服,在日后与宋江的相处中更是尊敬。在最后一回中,宋江为守自己忠君的节操给他下毒他也毫无怨言,坦然地接受安排,对宋江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1]1218 说完之后潸然泪下,然后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当时就泪洒一地,拜别了宋江之后下船离开。等他回到润州,身体早已支撑不住,最终惨烈离世。李逵临死之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1]1219 李逵如此看重忠义,愿将生死交托。虽没有受过系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儒家的“义”已深深刻入他心中。

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作风,符合孟子对义的追求。鲁智深为救被“镇关西”纠缠的弱女子金翠莲,去找镇关西理论,恶霸镇关西大怒和鲁智深打起来,这正应了鲁智深的心思,结果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实乃义举!首先,鲁智深与金翠莲父女并无亲属等实际关系,为其讨回公道并没有利可图。其次,鲁智深作为提辖,而镇关西郑屠作为财主,为金翠莲讨公道而三拳打死郑屠对自己的仕途没有好处,而且最终鲁智深只能削发为僧来逃脱灾祸。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鲁智深此举毫无利益的影子,而只为义,也就是做在道德上正确的事情,也契合了儒家强调舍生取义的思想追求。当林冲的妻子受到高衙内调戏时,鲁智深反倒比林冲本人更气愤,想要帮林冲出气被林冲本人阻拦才罢休。这一细节

更加具象地体现了鲁智深对朋友的义。鲁智深是一个好打抱不平、爱憎分明的英雄好汉，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可以对应他这一精神品格，一个人有正确的仁义观，出于公心能够正确选择喜欢应该喜欢的人，厌恶应该厌恶的人。只有仁者才能做到好善厌恶，才能喜欢值得喜欢的人，厌恶应该厌恶的人。

燕青从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卢俊义被骗到梁山泊，之后因此被家奴告发定了死罪，对此，有学者指出：“是燕青城外乞食、流泪跪求狱卒为主人送饭，一‘跪’，一‘爬’，一‘咽’，无比真切感人。”[7]“有恩必报、知恩图报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燕青英雄侠义形象着力表现的文化内涵”[7]。知恩图报是道义的表现，是“以德报德”的具体展现，燕青的知恩图报契合儒家所要求的精神品质。

二　儒家思想对《水浒传》人物形象上的影响

人物形象也能够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儒家学派认为，懂得伦理、遵守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最根本的一点，作为人之君子就应该拥有仁、义、礼、智、忠、信等品德修养[8]。

“同声相应归山寨，一气相随聚水滨”[1]706“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1]865，《水浒传》中不乏此类满含忠义之气的语句。《水浒传》最早的书名为《忠义水浒传》，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忠义”一词在水浒群豪中产生的纽带作用和价值意义。所谓“忠义”，天海藏《题水浒传序》中的解释最为明了：“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9]。杨定见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亦写道，“《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10]。当宋江登上梁山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后，引导所有梁山好汉的人格倾向和价值准则就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其实是对聚集梁山的英雄好汉“忠义”价值观的整合与改造。于是“忠”和“义”不分主次，共同成为衡量梁山好汉的主要标准。“忠义”也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影响着每一个人物的发展。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形象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小说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几乎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形象，具有仁义、孝顺、忠良、守信等品质。而以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形象与梁山好汉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奸邪、狡诈、荒淫、虚伪、腐败，与梁山好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水浒传》中，宋江可谓是具备拥有“仁、义、礼、智、信”君子形象的典型代表。他济困扶危，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常常慷慨解囊，被人称作“及时雨”；他讲求诚信，只要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同意给别人的财物就一定会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他对同途的好汉兄弟们十分讲礼义，受到了梁山各路好汉的认可和支持；他聪明智慧，不论是他私放晁天王，还是带领梁山英雄们获得了“三打祝家庄”等的胜利，都体现了他高超的情商与智商；他不愿弃宋从辽，忠心不负宋朝，最终主张接受招安，也体现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而高俅的人物形象则恰恰相反，他“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常常胡作非为且屡教不改。他不受人们的待见，却偏偏受朝廷的赏识。在有了昏庸无能的皇帝在背后为他撑腰后，高俅愈发地作恶多端，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污吏。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小人形象，并从反面说明了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要求和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批判锋芒。

（一）作品人物形象中体现了儒家“忠”的价值观念

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了“忠”的思想。作为一部以农民起义为故事题材的小说，《水浒传》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忠”的思想，但是也有所矛盾，表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首先，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官逼民反”，许多人物是在被朝廷奸佞、恶毒小人陷害，或一些变故后被迫落草为寇，虽身在梁山，实际上只是避难所，一旦朝廷赦免就会接受招安。具体表现在梁山大败朝廷派来的高太尉大军时，接下来的情节陡转直下，以宋江、吴用为代表的一众好汉力主招安，这说明他们心底其实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想要“忠君”的。

其次，《水浒传》主要以围绕不同人物的阶级地位、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遭遇、性格特征、文化水平等因素成功地塑造出了如此之多立体饱满、独具特色、个性鲜明、极为多彩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影随形。最具有代表性、最深入人心的人物非“及时雨”宋江莫属。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1]248。他扶困济贫、慷慨助人，是为仁；他担着血海干系挺身救晁盖，使七条好汉得以逃离魔掌，是为义；他让威猛强悍的李逵都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以他为首，是为礼；在他指导下取得了“三打祝家庄”“三败高太尉”等战役之胜利，是为智；他只要许诺了给人财物，就决不失信于人，是为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各种各样的行为都是当时社会中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再一次呈现。宋江从出场到退出，他始终戴着一副精致的儒家面孔，只是被道德约束

和包装了。

“智多星”吴用也是《水浒传》内着墨较多、智谋出众的人物,他的身上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子,儒家思想早已根植他心,对他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行为对话与意识形态之中,儒雅的气质,文思敏捷,出口成章,更多地体现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一些特点。儒家非常重视等级次序,所以在这种思想背景的影响下,吴用的懦弱和有时表现出的让步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可以看到,在他的所有行为或思想中,他会有意识或不自觉地遵守这样一种标准。在宋江壮烈地赴死以后,紧接着吴用也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宋江的誓死追随,永不背叛的忠义之心,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洞察到深藏在吴用内心深处强烈的儒家观念。他的身上折射着儒家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感。

梁山泊中的英雄好汉来自各个地方,身份背景也不尽相同。梁山泊中也有很多人原是朝廷的官员,受到陷害无处可去,才落草梁山。他们大都受过纯正的儒家教育,忠君思想尤为强烈。例如玉麒麟卢俊义,本是河北大名府出了名的富甲一方的大商户、令人羡慕的大财主、受人尊敬的员外,家财万贯,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也因为仗义疏财深受江湖人士的追捧。长期受忠君思想影响,卢俊义对梁山泊一直是不看好的,认为梁山泊好汉们多是贼寇。因此即使是宋江邀请,卢俊义宁死也不愿落草梁山泊。一方面是自幼所受教育所致,另一方面是对梁山泊的不认同。自己是大户出身,与贼寇等身,不仅会坏了自己的名声,更对不起朝廷。卢俊义的文化背景让他拥有强烈的忠君思想,与梁山泊众人的文化差异更让他感到自己不能与这些人伙同。即使是最后被迫落草,但朝廷招安时他也是赞同宋江愿意招安的。

(二)作品人物形象体现了儒家“孝”的价值观念

“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几千年来重视与发扬的精神品质,经典的孝子故事就有汉文帝的“亲尝汤药”,可见其思想的主流与重视程度。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2 孝道是践行仁爱的基础,足见孝之重要。在《水浒传》里孝道也是全书的灵魂之一,梁山能够聚集无数英雄好汉它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五大孝子,黑旋风李逵打虎,插翅虎雷横枷打白秀英,入云龙公孙胜,及时雨宋江,以及开篇第一个好汉王进。我们以李逵的故事为例,分析其中的孝道思想。

上梁山后,李逵思母心切,下山接母。当母亲问到其近况时,李逵回答的是:“铁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来取娘。”[1]523 对于这一谎言,文中有这样一句心理描写可作为解释,大意为李逵知道若说是在梁山泊落草,母亲一定不会去。这一善意的谎言既是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也是为了维护母亲的脸面,因为在当时,落草为寇必是说不出口的存在。《礼记》中曾说:“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11] 而李逵这一举动,正是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影响母亲脸面的做法,这体现了他内心的些许愧疚,以及他粗中有细的孝子形象。

李逵义释李鬼的做法也令人动容。面对冒充自己作乱的李鬼,一向鲁莽勇猛的李逵却因为李鬼说要“赡养老母”的谎言轻易放过,展现了全书中少见的“温柔”的李逵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李逵的价值观中,自己的名与利是不如孝道重要的。对于冒充自己的所谓孝子,李逵更注重的是杀掉这个“孝子”对母亲的影响,而不是逞一时之快、解一时之气。这里充分表现了他的同理心和对孝道的注重、深化和延伸。在李逵的价值观里,不仅希望自己对父母亲行孝,更希望孝道能得到推广与维护,让父母都得到孝子的回报。而当李鬼谎言败露,李逵对以孝道为挡箭牌,而行骗作恶之人忍无可忍,果断杀掉。

在李逵背着母亲赶路之时,因一时疏忽致母被老虎吞食,悲痛之下,李逵一人杀四虎,使故事情节达到了最高潮,加深了读者对李逵“孝子”的印象。

梁山好汉们都重情重义,也十分孝顺。公孙胜放弃官位回家侍奉母亲,武松侍兄如父。一些梁山好汉无亲无故,但他们对于孝行很是支持和赞同,晁盖、吴用等人还多次将孝子们的父母接上山奉养。《孝经》开明宗义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2] 自古以来孝道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首要精神,儒家的孝文化,在梁山好汉们身上也有所体现。

三 儒家思想在《水浒传》创作目的上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创作通常都不是作者的随意行为,而是有一定目的的创作。无论是想要讲述故事、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还是想反映社会、抨击现实,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其创作的目的和意图。

《水浒传》通过讲述一场悲壮的农民起义故事,展现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起义的酝酿、形成和发展到最后结束,深刻反映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实。《水浒传》在刻画英雄形象、歌颂

英雄好汉的同时，揭示了现实社会下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失败的原因，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残暴、贪官污吏的腐败丑恶，展现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施耐庵通过《水浒传》对现实的影射，表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体现了作者心中对儒家“以人为本”“仁政”思想以及“仁义礼智信”君子形象的向往和追求。

（一）《水浒传》创造目的体现了作者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弘扬

文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受招安时宋江对前来招安的宿太尉说到：“宋江昨者西岳得识台颜，多感太尉恩厚，于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忘。”[1]988 宋江认为梁山泊受招安是重见天日之光，自己终于得到朝廷认可，不胜欣喜。能够在朝廷施展自己的宏伟抱负一直是宋江的志向，为了谋求政治出路，他做过许多探索：结交江湖英雄，起义造反，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等，但这些并没有让他得到当权者的青睐和赏识。从他在江州浔阳楼醉酒后题诗前的一大段心理独白，就充分表现出他多年求取功名未果的失意、痛苦与迷茫等[13]。他本意是入仕做官，无奈却上山落草。

宋江身上所展现的，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形象，一心谋求仕途，对朝廷忠心耿耿，相比于落草，入仕或许才更符合宋江的心意。无奈落草，又一心想着归顺朝廷，宋江所受过的儒家教育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也决定了梁山泊的走势和招安后的悲惨结果。

后世对于宋江的评价，大多都是对朝廷的愚忠。的确，在文中描写的那样昏暗的时代，朝廷不公，人们应该起来反抗，而不是守着自己忠君的思想默默承受。但从此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之大，作为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儒家思想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水浒传》从智取生辰纲出发，梁山泊的英雄豪杰与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斗争，他们惩恶扬善，树立正气，开仓放粮，救济穷苦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片光明的天地。本以为他们会继续这条道路，但故事发生了转折，走向了招安的道路。在征辽战争中，面对辽国高官厚禄的诱降和吴用“弃宋从辽”的劝说，宋江道：“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1]1025 这番话鲜明体现出他心怀忠君思想，渴望为国建功，展现了儒家济世情怀。排座次之后，宋江一心招安，多次申明对朝廷的忠心。他认定自己忠肝义胆，“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如此闭塞，暂时昏昧”，所以竭力推进招安。由此可见，宋江仍对统治者心存幻想，走上造反的道路本是被迫之举，在他内心深处，忠君报国的思想从未磨灭。招安过程中，宋江多次向韩存保、高俅等表明“宋江等并无异心”，“安敢反逆圣朝”，“若蒙朝廷赦罪招安，刻骨铭心，誓死图报”的忠心。招安后，宋江力争征辽，挥泪斩小卒，不受辽国招降，都表现了其忠心耿耿。征辽班师后受到冷遇，众头领都有怨念，宋江表示，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而且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劝勉大家克制容忍。即使在他临死时犹念念不忘保持忠义，忧心李逵将他的一世忠义给毁，当让李逵饮了药酒之后，他才说出事情真相和矢志不渝的忠贞。接受招安后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受到朝廷迫害，结局悲惨，故事走向似乎渐渐与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伸张正义的行为和目标偏离。

这种结局看似不解，细细想来，实则必然。这一百零八位好汉里，有绝大多数好汉诸如宋江、卢俊义、林冲、杨志等原本皆为官吏出身，他们上梁山大多是被逼无奈之举。在他们早年的人生里，接受并信奉的就是儒家文化，内心仍保留着儒家思想观念，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并不曾被减除，在这种儒家文化的束缚下，他们并不会真心与朝廷抗衡，或许仍幻想着朝廷会再度接纳他们，忠君尊礼仍是他们的第一行动准则，这为他们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种子。

（二）《水浒传》创作目的体现了作者对儒家理想社会的向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就是做人的原则。仁和人合起来，就是道。“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5]（《孟子·梁惠王下》）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那么这些百姓就会亲近国君，并自愿为他们的长官去牺牲。梁山好汉们性格中除了忠、义、孝、礼外，还具有仁爱的思想。一些梁山好汉受到过官府的迫害，见过百姓疾苦，逼不得已投奔梁山，他们一方面互相称兄道弟，互帮互助，另一方面又匡扶正义，为百姓除害，见不得贪官奸商欺压弱者。他们在梁山起义，也因为不满统治阶级的暴政，渴望天下太平；他们抵御外部侵略，维护内部秩序，也因为想要保境安民，给百姓安定的生活，这反映出了英雄好汉们身上“仁爱”的品质。

《水浒传》深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是儒家文化

环境熏陶的结果,因此作品内容不可避免地在字里行间保留了儒家思想的痕迹,《水浒传》描写的梁山好汉、女性人物、故事走向、价值取向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当然,文中也存在某些低俗残忍、血腥暴力的描写以及某些草菅人命的人物塑造,这些都背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虽然这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历史,使塑造的人物更加立体多元,但这始终算是《水浒传》的糟粕,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孔子家语今注今译[M]. 薛安勤,靳明春,译注. 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23.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赵复三,译. 长沙:岳麓书社. 2018:43.
[5] 孟子译注[M]. 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0:172.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8.
[7] 郝姝婧. 试论《水浒传》中的燕青[J]. 名作欣赏,2016(36):62-63.
[8] 邝艳艳. 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J]. 北方文学(下旬),2012(11):12-13.
[9] 罗贯中. 水浒志传评林:上[M]. 余象斗,评.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2:4.
[10] 朱一玄,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87.
[11] 潘 斌.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3.
[12] 孝经译注[M]. 胡平生,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6:1.
[13] 宋虹桥. 从宋江形象探析《水浒传》中的儒家权变思想[J]. 榆林学院学报,2016(3):80-82.

The Embodi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ater Margin*

CUI Xue-ru, YIN Qia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e *Water Margi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is embodied by the story setting, character image and creation aim, which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ultural value.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in *Water Margin* embodies the benevolen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The heroes of Liangshan County, led by Song Jiang, almost all conform to the ideal Confucian image of a gentleman, with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filial piety, loyalty, good faith and other qualities. The image of the feudal ruling class represented by Gao Qiu was the opposite of that of the heroes of Liangshan County, who were wicked, cunning, immoral, hypocritical and corrupt, in sharp contrast to that of the heroes of Liangshan County. Through the allusions to reality in *Water Margin*, the author Shi Naian expressed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his yearning for and pursuit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theory and the ideal gentleman.

Key words: creation purpose; story setting; character creation; benevolence theory; gentleman

(本文编辑:刘衍永)